

紫金

紫金人类学书系

# 华中药市的崛起

——一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The Rise of a Chinese Medicine  
Distribution Market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傅琦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首任图书出版单位

# 华中药市的崛起

——一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

**The Rise of a Chinese Medicine  
Distribution Market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傅 琦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中药市的崛起：一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 傅琦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6  
(紫金人类学书系 / 范可主编)  
ISBN 978-7-5130-4928-3

I. ①华… II. ①傅… III. ①药品—商人—人物研究—  
中国—现代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0527 号

责任编辑：李学军  
封面设计：STSJ

责任出版：刘译文

## 华中药市的崛起——一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傅琦著

---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a href="http://www.ipph.cn">http://www.ipph.cn</a>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559	责编邮箱：752606025@qq.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5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1 千字	定 价：86.00 元

ISBN 978-7-5130-4928-3

---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紫金人类学书系

---

范可 / 主编

# 郝瑞序

“紫金人类学书系”的创建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人类学进一步成熟。这一经过艰难曲折的学科，正在实现它几十年的承诺，发挥它应有的贡献，展望着它的未来。

现代中国人类学的传承是多样性的，三条支流汇入一条新的主流。第一支流是新中国成立前接纳欧美的两个比较新的学科，改变它们而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在人类学、社会学两个旗帜下，学者们在汉人农业社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实地调查。成果不少，包括中外文著作、文章，也有一些很嫩的新理论的萌芽。这条支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堵塞，但没有完全断流。当代学者在如吴文藻、费孝通、芮逸夫、凌纯声、林惠祥、林耀华、梁钊韬等先锋长辈所打下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民族志工作而创建部分本土化的理论。这个支流的特点是强调研究现实社会和理论方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社会服务精神很浓。

第二支流是新中国所带来的苏式民族学，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占据了学科霸权的地位。它为服务党和政府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扩大了对象范围，推进学科的系统化，在之前比较薄弱的知识基础上添加了丰富宝贵的资料与知识。但是，这条支流的发展，却导致了两种不利于学科发展的现象：首先是对象范围又回到最边缘的小社群，把研究对象限制到少数民族群体，把汉人社区推到社会学的地盘。继而又视社会学为“资产阶级”学科而把它取消，从而实际上阻碍了人类学对汉人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个支流的特点是强调历史演变，理论方法比较生硬，但社会服务

精神也很浓。

第三支流是世界人类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巨变，对象从“原始”社区扩大到全球化的世界里的固定或流动的社群，理论从文化单位相对论和结构主义转到文化互相交流、重构、融和论和后结构主义。这条支流进入中国人类学主流的过程比较长，因为老一辈的学者大多习惯了苏式民族学的思考方式。但是，因中外人类学者在八九十年代加速交流，如范可博士和他同辈学者们不少人都在欧美国家训练，接受了新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新世纪一开始，这个支流的影响在中国加速。它的特点是注意世界各种人口、思想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社会服务精神有浓有淡。

范可教授在我执教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帮助中国人类学三个支流汇集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但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在厦门大学读书和教学而对中国人人类学传统宝库有深入的了解，知道有哪些地方尚待改进，又在跟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了解了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他把自己的两个支流都注入南京大学新建的人类学科研和教育的大茶壶里，和他的同事一起，建立了一个既传承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又加入世界人类学共同体的教研机构。

我 2012 年访问南京大学并进行演讲期间，范可博士给我安排机会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交流，了解他们的训练和研究，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以自己在社会上的经验和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选了既对社会问题，又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有价值，而且有可能作出贡献的对象与主题。因此，当我接到范可教授的来信，告知将要推出“紫金人类学书系”时非常高兴，但并不吃惊。建所 10 周年是应该有成果的时候，只需要有个场合将它们发表、呈现给国内外人类学界。为此我们也应该感谢李学军先生，他及他的出版社给中国人类学界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平台。

我最近几年遇到愿意在中国国内读人类学研究生的中国学生，总是推荐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范可教授。本书系的创立，更加强我这个趋向。不仅中国人类学界而且世界人类学界、中外社会科学界，以及所有关心中国社会问题的同仁们，都应该重视范教授和他的学生的贡献。我祝贺书系的创立，希望本书系和它所代表的人类学发展过程将来能进一步发展，扩大它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贡献。

郝瑞 (Stevan Harrell)

2015年4月11日于西雅图

# 周晓虹序

时间过得真快，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已经10年了。记得2001年5月我担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时任校长蒋树声教授与我例行谈话，主要议题即是社会学系的学科建设问题。那时的社会学系教师总计不过20人，教师中包括日本归来的贺晓星博士在内，有博士学位的也不过4人，其中我和张鸿雁教授获得的还是历史学博士学位。当时系里的大多数教师除了上一些社会学的课程外，还必须教授1—2门保险学的课程，尽管没有一位教师受过保险学的专业训练，但此前系里将此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学建设的有效路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对保险学一窍不通的社会学专业的老师们疲于应对的窘迫，记得我自己是通过开设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学来消弭这一窘迫的——好在保险专业的训练十分看重“展业”能力，而这些课程对于保险人才的展业能力，一句话，“推销”保险都是必不可少的。<sup>①</sup>在我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之职，尤其在将保险学专业交还给商学院后，除了进一步推进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外，再开辟哪些新的领域或专业，成了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也是与蒋树声校长谈话的主题议题。

在当时的社会学一级学科设置中，只有4个二级学科：社会学（这即许多教授所诟病的老子、儿子同名——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都

---

<sup>①</sup> 说句实话，尽管由我这样一位社会学背景出身的教师教授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学似有不妥，但我个人的经历和此时的兴趣使得这样的“充数”倒不至于误人子弟。自1992年为仪征化纤公司设计和策划整体企业形象（CIS）并写出“与世界共经纬”这句流行一时的广告语后，我对广告和公共关系的兴趣空前高涨，还在1995—1999年四年间开设了一个名为“九歌广告公司”的机构，一度做得风生水起，直到1999年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才收手作罢。

叫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在我们的 20 位教师中,除了社会学(当然还兼及保险学) 18 人外,另有 1 位教师教授人口学、1 位教师分别教授人类学和民俗学。社会学自不必言,在整个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它的从业人员最多,学理根基、社会影响和实用价值也相对最大,如果要在中国社会学界“安身立命”舍此难觅其他。所以这 15 年来我们一直积极地“组建”最好的社会学研究团队,除了提升原有教师的水准外,从最初引进风笑天教授到后来引进彭华民、刘林平和吴愈晓教授,团队建设从来没有停滞,包括陈云松、郑震、郑广怀、梁莹等一些年轻学者陆续加盟,我们的社会学学科建设确实称得上风生水起。

不过,尽管作为二级学科的社会学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地位显著,但单单一个社会学是难以支撑起整个学科的大厦的。人口学地位独特,在中国最初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加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支持,中国的人口学建设曾经一枝独秀,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综合性大学不仅都设有人口学研究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在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的支持下最初都经费充足——我记得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中国每万人仅有 5 辆汽车的时代,许多大学的人口学研究所甚至拥有自己的小轿车,那让人羡慕的感觉就像现在的“土豪”拥有自己的直升飞机一样。但是,南京大学的人口学却命运多舛,在早期的一度繁荣之后,随着几位老教师的退休和年轻教师的出国,剩下不多几位人口学教师却连同机构——人口学研究所——留在了商学院。这些年来商学院因开办各类 MBA 尤其是 EMBA 在经济收入上的“一枝独秀”,使得人口学教师大多不愿意离开商学院,更不愿意到与草根社会打交道的社会学系——尽管这是教育部划定的人口学的学科归属。这样一种奇怪的学科建制,自然妨碍了人口学学科的发展:商学院虽然不能将早先的几位教师“赶走”,但对发展人口学显然也没有任何兴趣;新进的人口学教师在社会学系及后来的社会学院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学术机构(学校明确规定,在同一个学科方向上不能同时建两个同

名学术机构)，这使他们难以形成自己鲜明的学科认同。我认为，南京大学的人口学之所以会由盛及衰，一方面与国家的整体人口大势的改变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上述独特的学科建制有关。这也是为何这些年来我们在人口学学科上只引进了毕业于德国马尔堡大学的陈友华教授等不多几位人口学教师的缘故之一。

这样一来，学科发展除了社会学以外，当时只有人类学和民俗学两条道路可走。考虑到人类学在英美国家一直是文理学院常规的学科建制，它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并称社会科学的五大学科；而民俗学在多数国家只是人类学下的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其关注的民俗现象确实不过是特定民族的文化表征之一，中国的民俗学者又主要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基本只有一种选择：推进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记得要选定这样的学科发展目标，对当时只有半个人类学教师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记得在与蒋树声校长的谈话中，我对校长说，人类学家关注异文化，尤其是不发达的国家与社会，所以在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先后崛起的英国和美国也先后成为全世界人类学的大本营；我也对校长说，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崛起，我们也一定会发展出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研究兴趣，从人类学研究的客体转身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值得庆贺的是，作为物理学家的蒋树声校长一听就懂，他不仅同意了我的学科发展设想，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积极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既然确定了发展人类学，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能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优秀学者。恰逢此时，2002年秋，我应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ACPSS）邀请，前往地处硅谷的圣何塞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参加ACPSS的学术年会。会议结束后，我前往紧邻加州北部的西雅图，拜访我的朋友、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Ann Anagnost教授，希望在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能够获得她的帮助。记得我的想法一表达，Ann就推荐了前一年刚刚获得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范可，并且立即驱车带我去范可家拜访。范可博士在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前曾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并担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不仅受过人类学学科严格训练，而且在中美人类学界都有着广泛的人脉，是理想的学科带头人。尽管谈话只有一晚，但我们却一拍即合：2004年5月，范可博士由西雅图赶赴南京，受聘南京大学教授，并正式出任新建的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有了开端，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接下来，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杨德睿博士来了，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邵京博士来了，两位更为年轻的人类学博士褚建芳和杨渝东也从北京大学来了，短短几年间我们的人类学研究所一下子有了6位正式的教师，就其规模而言在综合性大学的社会院系中大概仅次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系所，我们所期望的人类学研究队伍一时间初具规模。

在最近10年的时间里，人类学研究团队招收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开设了10多门各类课程、召集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人类学会议，还邀请了诸多海内外人类学家来南京大学交流讲演、举办了题名“谋思谈”的系列seminar，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范可教授都起到了核心和枢纽作用，他对人类学知识在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紫金人类学书系”是范可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近年来的研究贡献，它一方面代表了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在1949年前就开始的人类学传统得以延续。可以确信，这些研究著述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之进步，而这些进步将会一点点积累起来成为我们这个大变迁时代的精神成就。

是为序。

周晓虹

2015年5月20日撰于南京大学113周年校庆

# 总 序

---

本书系缘起于出版人李学军先生与我的一次邮件联系。李先生在邮件中表达，他所供职的知识产权出版社非常期待多出版人类学方面的著述。他的盛情相邀使我考虑：何不借此机会出版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呢？于是，就有了“紫金人类学书系”的构想。之所以用名“紫金”有两个意思。其一，我所供职的南京大学坐落于紫金山麓，紫金于是经常成为学校的象征。其二，我在国外的母校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以紫金为主色调。紫金是学校运动队战袍的颜色。所以，前者表明了这套书系的作者们与南京大学的关系——供职、同事、师生、校友；后者表明了师承上的关系。目前为止，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唯有我一人为博士生导师，所以在第二位博导所带学生的成果出现之前，我会乐于强调这样的师承。同时，我还必须说明，一所大学所培养的博士成色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教授们的言传身教或者耳提面命，而是取决于所处的氛围。一所好的大学一定有着良好的交流与讨论的传统。与国内其他大学相比，南京大学相对说来更为自由的学风和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氛围熏陶了我们的学生。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2月，今年恰逢10周年。但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一直有着人类学研究。原中央大学的凌纯声先生是位著名人类学家，曾对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对湘西苗族等也出版有细致的田野调查报告。金陵大学农村经济学者卜凯（John Buck）和他的同事们也对中国农村有过十分深入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地调研，研究成

果在海外学界被广为援引，并曾引起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农村土地与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而柯象峰等学者则在当年有着一定人类学色彩的“边政研究”上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贡献。他们，是当今活跃在学界的南京大学人类学群体的学术前辈。今天，我们传承的是他们的薪火。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机构成立 10 周年总该有些表示。这套书系的推出可视为我们自己对 10 年来走过的路子的一个回顾。它仅仅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片段，因为它只涉及在南京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同学们的阶段性成果，展现他们所经过的人类学“成年礼”。所以，列在这套书系里的第一批成果仅仅展现了我们这个研究所成立 10 年来所做的部分工作。

任何一个研究与教学机构没有出版必难以立足。自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以来，现代大学除了承担教书育人的工作之外，知识的生产已经是工作的重心。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大学承担的研究工作与知识贡献简直无法想象。知识的生产除了开发未知的领域之外，还包括对周围自然与人类自身的了解与理解。社会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以他们的视角与方式，探求人们的心灵世界与行动的意义，并力求理解这些意义。100 多年来的学科历史表明这么一种过程：从对世界和人类自身本体意义追寻到认识论意义上的讨论，并进而再回到本体论意义上的解答。这样的过程背后，反映的是时代的变迁对人类学知识发展的需求。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然全球化。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都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一潮流已经不可逆转，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以置之度外。那么，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除了那些凭直观就可以体察到的现象与事实之外，还有如费孝通先生早在世纪初年便已指出的“问题的全球化”。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我们才有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只不过因为它们都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语境里才有了具体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它对今天的人类

学研究或者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带来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问题的时代。人类学研究在这个时代里，有了许多新的刺激和议题。正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流动性的时代，人类学的议题和关注也就必然不再以那种预设 of 停滞不变的社区或者文化为对象，因为在事实上那样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我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从事实地研究，我们关心的依然是它的变动与流动。民族志研究上体现出来的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流动与静止的预设，固然可以反映人类学学者的局限与认识的发展，但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你要不感受到“流动”还真不行。因此，今天的人类学也就对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要求：我们都应当直面当下。在一个问题全球化的时代从事人类学研究，就应该有所担当（engaged）。我们除了深化学理性的认识之外，还应当对“现状”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挑战。令人兴奋的是，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们都在研究中寻找真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回答。

这一书系里的民族志作品，从选题到田野地点的选择都是同学们自己进行的。作为指导教授，我只能就他们的研究打打边鼓，或者与他们聊聊天谈谈研究方面的问题以为“启发”。整体研究工作都是同学们自己完成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学院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师们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传道授业的教泽令同学们受益匪浅。我的母校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和安德训（Ann Anagnost）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Robert Weller）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石瑞（Charles Stafford）教授、哈佛大学的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布朗大学的顾德民（Matthew Gutmann）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在他们或长或短的访学期间，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同学们进行了指导或者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尤其是我的业师郝瑞教授，他在紧张的行程中，还不辞辛劳地专门召集正在进行田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们，询问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并具体进行指点。魏乐博教授作为

福布赖特学者在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访学一年（2013—2014）。在此期间，他参与所里的各种活动，经常与同学们切磋讨论答疑解惑。在此，我代表我们的同学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国内学制的限制，我们很难要求同学们也像国外人类学研究生那样，进行至少长达一年的田野研究。其实，一旦我们的田野工作以“问题”为基础，那么，是否一定得进行一年以上也就成了问题。尽管我没有对同学们的田野工作有任何硬性要求，但同学们也都尽量克服困难，尽可能地在田野里待更长的时间。有的同学写作期间还反复回到实地，进一步充实资料以求印证写作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一些思考，或哪怕是求得一丁点儿的证据。毋庸讳言，从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来看，这些同学的民族志著作不可能没有瑕疵，它们可能看上去还稚嫩，有些地方可能还有待商榷。但从选题到研究的视角，它们都生机勃勃，饱含了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它们都关注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体现了一代学子的担当意识和对未来的期许与关怀。他们的成长令人欣慰。本书系中的民族志著作都燃烧着作者的学术激情，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与未来应该属于这些有着强烈使命感与问题意识的青年学子。

范可

2015年2月9日

# 范可序

“发展”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张扬而滥觞的概念。科学、理性必然带来进步，进步必然推动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启蒙带给人们的逻辑。这些启蒙运动以降所出现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无庸讳言，也给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进步。在理性与科学这套话语背后，是一种线性史观。到了19世纪，这套话语成为一种具命定性的进化主义表述——人类社会必须不断进化，不断进步，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进化论的诞生无疑是对启蒙的某种继承。如果追得更远，则与古代基督教世界的“存在大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有关。这是一种带有等级自上而下的结构，最顶上自然是神，其下依次为天使、月亮、星星、国王、君主、贵族、平民、野生动物、驯化动物、植物，等等。再往前追，这种链条式的分类结构则可以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学说中窥及。这一具有高低级次的链条，后来催生了进化论（evolutionism）——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们更多地从各种有关达尔文的故事和书籍中知道这一概念。但也正是这一所谓的“大链”的观念性存在，成为了生产诸如“进化”、“进步”、“发展”等观念的内生性资源。到了19和20世纪，“进步”和“发展”已然成为强权抢夺世界市场的钥匙和利器。影响所及，这些观念又与现代主义理念搅和在一起，在“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时代里，逐渐地占据了其他急于“现代化”的国家的思想地盘。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大英帝国从世界霸主地位淡出，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独立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就是在国

家建设上追求现代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就指出，急于现代化自然是为了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具有其存在和上升的空间。杜赞奇说过类似的话：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帝国主义逻辑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逻辑。总之，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之后，经常是追随西方大国的足迹来发展自己。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学者用心理学术语“发展综合症”（developing syndrome），来比喻“二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以上是“发展”成为潮流的历史背景及其部分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力。如果聚焦到具体的国家，乃至地方，毫无疑问，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责无旁贷的，所有的政府也都作如此想。但是，正如“发展综合症”所暗指的那样，发展本身可能带来许多问题，成为乱象丛生的渊藪，尤其是那种在办公室里规划出来的“发展”。这种发展其实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在我们国家，由于公权力十分强势，如何发展可以任由官员定夺。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实在是迫于无奈的结果。这里的原因或许和“分税制”的改革有关。总之，我们可以把这些现象看作是某些不足或者失误所导致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声称“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尽管乱象丛生，也不能排除存在着乱中取胜的机会。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解决自身财政问题上启动的土地财政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并几乎绑架了中国经济，但它也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了经济规模，使不少中国人在短时间内致富。当然，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凡是明眼人都能看到这一点。

今天，“发展”已然成为各级政府的魔咒，它是政绩的衡量指标，由此，其本身也成为发展的动力，此即所谓“为了发展而发展”。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是否有“不发展的自由”这样的话题。这一话题的出现表明，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是关乎政府绩效的事，它